

(豫)LJ201007号

内部资料·免费交流

濮阳党史

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编印

2025 第2期 (总第91期)



要闻速览



当地时间4月16日，在维也纳联合国中文日上，濮阳乐团用非遗乐器奏响“中国好声音”。



4月28日，第25届张姓拜祖大典非遗展演在张挥公园举行。



五一期间，濮阳文旅市场火热依旧，全市接待游客389.12万人次，旅游收入11.35亿元。



5月30日，经开区胡村乡大村村的金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轰隆作响，迎来了今夏麦收“第一镰”。



5月31日，第三届濮阳市凉皮美食季启动仪式在经开区绪村政和里·夜集举行。



6月1日，艺术点亮城市——“童音拾光”流行音乐会在示范区龙湖东湖蝴蝶岛精彩上演。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

5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郑州考察时指出：

新时代新征程，河南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战略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农业强省，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白马寺见证了佛教传入、发展并不断中国化的进程。历史证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要积极引导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中央八项规定是党中央徙木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是今年党建工作的重点任务。要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夫，把党员干部个人查摆整改与组织查摆整改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作风硬要求变成硬措施、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要认真履职尽责，把工作重点放到推动解决问题上，精准指导、务求实效。

存史 资政 育人

濮阳党史

2025年第2期

(期/季 总第91期)

编印单位：
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
地方史志研究室

主 编：齐向前
副 主 编：张宗相
执行主编：唐利平
程 蕾

封面图片：
龙湖风光 高辉
封底图片：
戚城遗址 程蕾

目录

卷首语

1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理论学习

10 持续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驰而不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

赵庆国

研思集萃

13 党的外围组织南乐简师“读书会”

齐桩 王雨亭 宋锡九 宋在久 焦崑

红色记忆

19 白潜日记（1947年）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

课题聚焦

24 邓小平清丰“六六讲话”的深刻启示与新时代价值

马洪涛

27 以濮阳地区干部南下研究为例浅谈党史专题研究

王自伟

史志研学

33 濮阳乡贤赵廷瑞和他主修的《陕西通志》

周进鹏

37 澶渊之盟：北宋的盈亏之辨

王淑宁

41 唐宋时期澶州城的治废兴衰

杜宇航

奋进历程

44 2025年4~6月中共濮阳市历史大事记

《濮阳大事月报》编辑部

地 址：

濮阳市人民路 158 号

市委办公楼五楼 507 室

电 话：0393-4426890

邮 编：457000

电子邮箱：pydsyjs@163.com

发送范围：

本系统

准印证号：

河南省连续性内部资料

(豫) LJ201007 号

印 刷：安阳长顺印务

印刷时间：2025 年 6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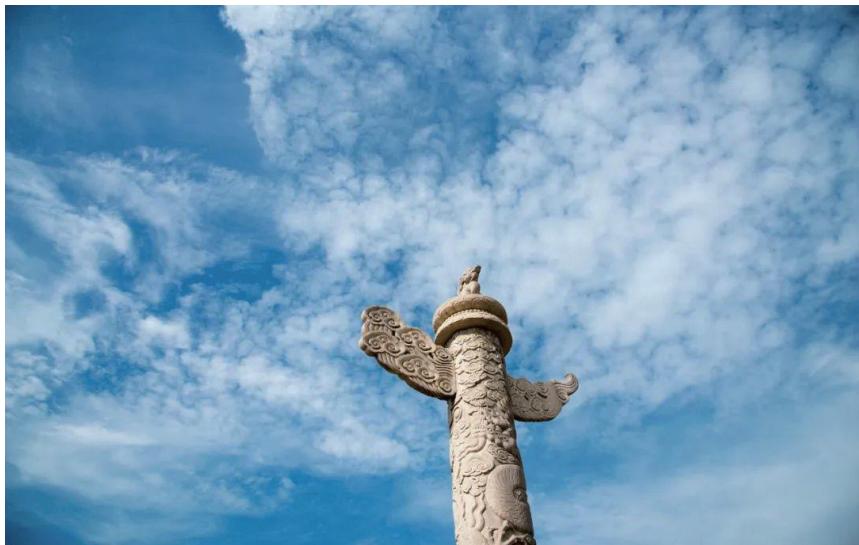
印刷册数：240 册

濮阳党史方志网：

http://www.pydsfz.com

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经验和启示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培育并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优良传统作风。深刻总结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推动全党正在开展的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对新征程上继续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抓住党性这个作风建设的根本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

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一路走来，我们党始终抓住党性这个作风建设的根本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加强党性锻炼、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筑牢了作风建设的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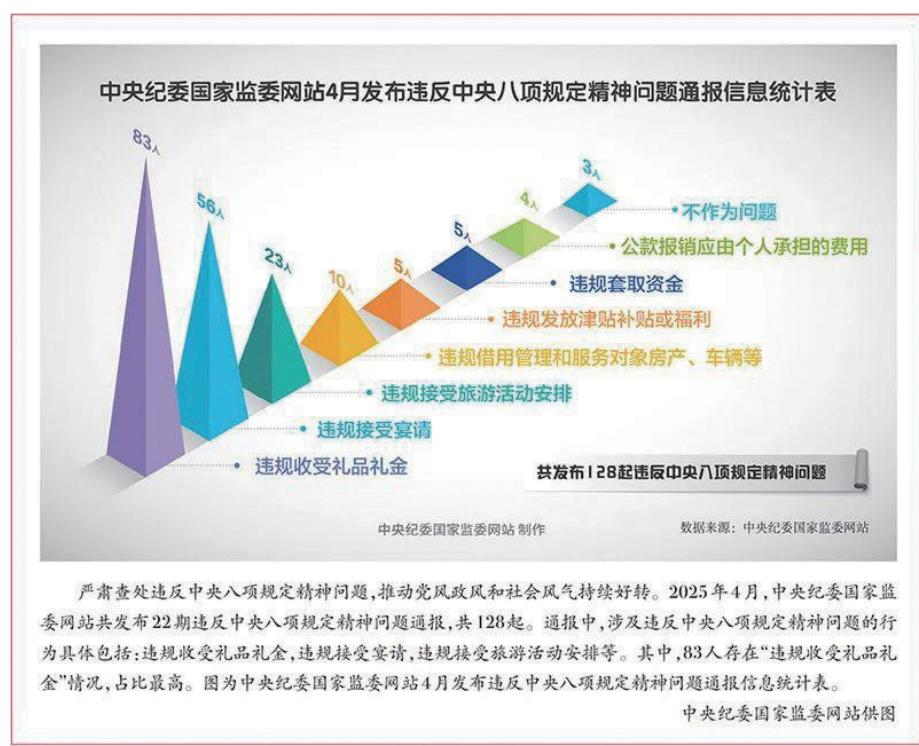
以锤炼党性为基础。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我们党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要求，强调“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坚持把党性教育、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从而永葆先进性、纯洁性，以好作风好形象不断创造新伟业。早在 1921 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规定了党员在入党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等一系列原则。在总结党的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1941 年 7 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建党以来第一份以增强党性为主题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

定》。自此以后，加强党性锻炼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注重透过作风抓党性，抓住党性改作风，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提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的重要论断，拓展和丰富了对党性教育的认识，党性教育也成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

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本。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坚定理想信念是根本。我们党注重把理想信念这个共产党人的“本”牢固树立起来，从而炼就金刚不坏之身，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在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之际，年逾半百的老教育家徐特立面对狂风恶浪而信念笃定，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盛赞为“没有字的教科书”。延安时期，共产党人“理想至上”的精神感染了许多到访者，美国人约翰·科林深有感触地说：“他们的衣服破烂不堪，他们的装备缺枪少弹，但他们有为目标奋斗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最终“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建立新中国的动力源泉，也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的十八大后不久，

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讲到如何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问题，第一条就是坚定理想信念，强调这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力量和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把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作为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接续开展8次党内集中教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深入，取得了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显著成效。

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本立而道生，本正而形聚。作风反映的是形象和素质，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而党性强弱又决定于理想信念是否坚定。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主观世界，筑牢



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一路走来，我们党始终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夯实了作风建设的根本落脚点。

深刻认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要求广大党员坚持群众观点，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站稳作风建设的根本立场。革命战争年代，党常将党群、军民关系比作鱼水关系。这种鱼水关系，为我们建造了一道十分安全的铜墙铁壁。毛泽东同志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提醒全党，如果“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的重要论断，深情指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就会把我们当亲人”，“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站在这样的认识高度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坚持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

无盐同淡，书写了人民至上的崭新篇章。

以有效举措使党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党提出并践行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工作路线，有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落到实处，从而得到群众真心拥护，让党群关系真正密切起来。1929年，毛泽东同志在给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授课时强调：“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随时随地都要念叨‘争取群众’，这是共产党的护身法宝”。看到苏区干部切实为群众谋利益、解难题，群众由衷地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习仲勋同志被毛泽东同志誉为“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他反复强调要“把屁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总是把群众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用心用情予以解决，因此，“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改革开放以后，为了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脱离群众，党先后作出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多个决定，通过践行群众路线，切实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密切党群关系。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在带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开宗明义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信践诺，提出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乡亲们是哭还是笑”当作“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的衡量标准，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努力把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食

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持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新征程上，我们必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脑中常谋富民之策，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具体落实到行动上，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群众根基。

改进作风必须自上而下、以上率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在作风建设方面，领导干部带好头是无声的示范”。一路走来，我们党始终要求各



近年来，各地持续深化减负工作，把基层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广大基层干部放开手脚、轻装前行，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促发展、办实事。图为2024年3月25日，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政务服务中心内，市民在反映“办不成事”窗口咨询。新华社记者 李欣 / 摄

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带头转变和改进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掌握了作风建设的主动权。

牢牢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我们党从“关键少数”着手，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正人先正己”，“敢于拿自己开刀”，从而解决作风问题才能势如破竹，改进工作作风才能立竿见影。1947年，朱德同志在讲到转变作风问题时指出：“守纪律要首先从上边守”，“我们和毛主席在井冈山时就是这样，规定了什么就自己首先遵守”。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陈云同志在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期间指出：“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下面就不敢乱来，领导要是自己开了口子，那下面就乱套了。”这些朴实的话语深刻说明：在作风建设问题上，领导干部虽然是“少数”，但作用很“关键”。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就明确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关键在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要带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中央怎么做，上层怎么做，领导干部怎么做，全党都在看”的清醒和自觉，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中央政治局抓起，引领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呈现新气象。

推动形成领导干部走在前、做示范的“头雁效应”。我们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由上而下，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传导压力、层层抓好落实，从而引领作风建

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带动形成良好的党风政风社风。革命战争年代，在枪林弹雨中，干部在前面一冲，不用讲话，不用动员，战士们会自动地跟上来。延安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开荒种地、背篓拾粪、捻棉纺纱，带动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开展。改革开放新时期，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就高级干部住房、用车等作了严格细致规定，以实际行动反对特殊化，发挥了“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作风，制定出台并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以实际行动给全党改进作风作表率。对于中央八项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态度鲜明，强调“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起到了“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的效果。中央八项规定已成为党的作风建设的代名词，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张“金色名片”，党在人

民心中的形象实现重塑。

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正人必先正己，正己才能正人。干部作风是人民群众观察评价党风的晴雨表，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从己做起，是无言的要求、无声的号召。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对作风建设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实践先一着，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带头转变和改进作风，勇于自我革命，积极担当作为，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冲在前、干在先。

作风建设要坚持立破并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建设是立破并举、扶正祛邪的过程”，“要坚持纠‘四风’和树新风并举”。一路走来，我们党始终不忘初心，弘扬清风正气，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以铁腕纠治歪风邪气，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找到了作风建设的管用办法。

扬正气、树新风，推动全党崇德向善、见贤思齐，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我们党通过抓典型、树榜样，为改进作风树立了鲜明导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弄清楚“哪些应该做”，不断提升作风建设的水平。在中央苏区，兴国县各级干部深入实际，创造了党员、干部“十带头”的好风尚。毛泽东同志题写“模范兴国”4个字，号召苏区干部向兴国县学习。新中国成立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王杰等一大批先进典型不断涌现。“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永远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



各地聚焦民生领域问题线索，紧盯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人和事，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图为2025年3月26日，山东省日照市纪检监察干部在岚山区巨峰镇向茶农了解乡村振兴资金使用、产业项目收益等情况。新华社发 朱元理 / 摄

历久弥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对先进典型和功勋模范进行表彰。受表彰者中许多是长期奋战在各行各业一线以及基层地区的共产党员，如张富清、黄大年、黄文秀等，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忠诚信仰、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激励着全体党员强素质、改作风、建新功，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不断向上向善。

纠歪风、压邪气，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及时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不正之风滋生掩藏腐败，腐败行为助长加剧不正之风、甚至催生新的作风问题。我们党通过反腐败、除毒瘤，及时整治腐败变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警醒广大党员、干部弄清楚“哪些不能做”，坚决守住作风建设的底线。1926年8月，党中央发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反腐文件《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有效净化了党员队伍。延安时期，我们党开展了一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开创了以整风方式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成功范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强调：“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从1950年到1955年的6年时间里，党连续开展5次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以优良作风推动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1983年10月，党中央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纠正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不正之风，使党的组织进一步

纯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输不起的斗争，使党风政风焕然一新。

历史经验启示我们：立破并举、扶正祛邪，才能政通人和、海晏河清。既注重扬正气、树新风，又坚决纠歪风、压邪气，二者相互配合、并用共举，是开展作风建设的有效方法。新征程上，我们必须用好有立有破、立破并举，扶正祛邪、激浊扬清这一重要方法，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作风温床，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

回顾走过的路，是为了走好前行的路；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以史为鉴，把握现在、开创未来。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急剧增多；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许多难关和挑战。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总结运用好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驰而不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来源：《求是》2025年第10期）

持续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驰而不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赵庆国

当前，我们已经踏上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必然会遇到各种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就越要强调加强纪律性，这是我们党立党兴党的强大武器，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必然要求，是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一、扛牢政治责任，着力加强纪律建设的政治性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必须首先从政治上看，着力提高纪律建设的政治性。这不仅是提高党的政治建设水平的内在要求和坚强保证，也是保证党的纪律建设方向和效果的内在需要和必然要求。提高党的纪律建设的政治性，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增强“四个意识”，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将“两个维护”作为纪律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将政治性要求贯

彻到纪律建设的诸方面、各环节、全过程，贯彻到监督执纪问责的日常工作中去。**一是要在党内监督中贯彻政治性要求，着眼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守政治巡视职能定位，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政治巡视，把“两个维护”作为巡视工作的根本政治任务。****二是在执行纪律中贯彻政治性要求，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协同，突出执行纪律的政治性、严肃性；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突出政治纪律的首要和根本地位，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三是在党内问责中贯彻政治性要求，着力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

二、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提高纪律建设的时代性针对性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引，聚焦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对党规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列举出六项纪律的“负面清单”，强化正向引导，使党员、干部的行为边界更加清晰明确。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六项纪律为“镜子”，经常照一照、量一量，认真查找差距、检视问题，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一是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始终做到立场坚定、对党忠诚。政治纪律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全市广大党员要树立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标准，时时刻刻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标对表、保持一致。任何时候都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对党绝对忠诚，与党中央同心同德，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二是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始终做到听党指挥、步调一致。组织纪律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党的战斗力的基本条件。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理解“四个服从”的丰富内涵，切实认识违反组织纪律行为的危害，持续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增强组织观念，常怀大局意识，严守组织纪律，处理好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处理好自由与约束的关系，始终做到绝对服从，自觉接受组织监督，真正做到让组织放心托底。**三是严格遵守廉洁自律**，

始终做到廉洁奉公、干净清白。廉洁纪律是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重要保障。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严守廉洁纪律、谨记用权之要，始终做到一尘不染。要认真学习好用好廉洁纪律，一方面弄清楚“廉洁底线是什么”，更好掌握廉洁用权的行为规则；另一方面弄清楚“廉洁底线怎么守”，坚持规矩做事，坚决反对特权；坚持清爽交往，坚决防范“围猎”；从小事小节守起，始终公私分明；坚持清白从政，坚决抵腐纠风，不断筑牢廉洁自律坚固防线。**四是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始终做到心系百姓、为民造福。群众纪律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牢记党的根本宗旨，紧扣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顺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下沉一线察民情，深入基层解民忧，融入日常暖民心，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不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五是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始终做到勤勉敬业、担当作为。工作纪律是党的各项工作正常开展的重要保证。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遵守党的工作纪律，切实做到履职尽责、真抓实干、善作善为，大力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持续开展制造业倍增行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产业升级构筑竞争优势，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更有效的产业载体，在攻坚克难中不断创造新业绩、打开新局面。**六是严格遵守生活纪律**，始终做

到品端行正、一身正气。生活纪律是党员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对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列出的负面清单，强化身份意识，履行好党员义务，时刻自重自警自省自励，更好承担起党员责任。既管好线下又管好线上，既管好自己又管好家人、既规范言行又兼顾影响，严格以生活纪律来要求和管束自己，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切实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三、提高系统思维能力，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制度管党、从严治党一体同向发力

没有“真经”指引，没有理想信念，必然迷失方向；没有制度约束，必然一盘散沙；没有铁腕执纪保障，必然难以长治久安。管党治党必须坚持自律与他律、高标准与守底线、正面倡导与负面禁戒相结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制度管党、从严治党紧密结合、同向发力。一是充分发挥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力量，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全党增强政治定力的重要基础。我们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贯通起来，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汇起来，坚持带着信念学、带着感情学、带着使命学，强化理论武装和党性修养，树立革命理想高于天

的理念，不断补钙壮骨、固本培元，始终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二是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要严格遵循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制度建设，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制度管党、依规管党。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及时将改革探索中的成果固化为党内法规制度，把党章党规中的纪律要求具体化，不断健全党内法规体系，拧紧管党治党的“螺栓”；要不断增强党内生活和党的建设制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实现制度建设与时俱进，通过完备的制度解决行为规范、约束监督问题，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使其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使制度真正成为管党治党的重要利器。三是严格精准执纪，切实维护纪律刚性。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在认真，要害是从严。以强化纪律执行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不折不扣落实；以强化纪律执行遏制党内消极腐败现象，持续推动新风正气不断充盈；以强化纪律执行赢得民心、赢得主动，凝聚起迈向伟大复兴的蓬勃力量。总之，一定要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制度管党、从严治党一起部署、协同推进，做到刚柔并济、相得益彰，产生一加一远远大于二的功效，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党的外围组织——南乐简师“读书会”

齐桩 王雨亭 宋锡九 宋在久 焦崑

南乐简师“读书会”的建立

南乐简师是“南乐县立简易师范学校”的简称，创立于1934年初，学制为4年，其前身为“南乐县立乡村师范学校”。校址设在南乐城内东北隅原关帝庙内，校舍系由关帝庙改建而成。由于规模较小，设备简陋、每届只能招收一班学生（当时每班定为60人）。我们几个人：齐桩、焦崑、王雨亭、石一彬、孙汉章、张军直、宋锡九、宋在久等，除孙汉章同志外，都是1934年初考入南乐简师的，是该校第一届学生。

南乐是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小县城，国民党统治力量较薄弱。南乐简师是规模很小的一所学校，教职员多系当地人，且出身于农村，学生以农村贫苦农民子弟居多。当局办学的目的是为农村培养小学教员，平时不为外界所注目。校长李文华先生系无党派人士，为人正派，不媚权贵，其有真才实学，热心教育事业，在南乐教育界有一定的威望。教员郭彩岑、邵汉三系刚出大学不久的青年教师，思想比较进步，教学比较认真，提倡读书自由，和学生关系比较密切，在学生中有一定威信。1936年前，在张用恒任国民党南乐县政府县长期间，学校的思想统治不甚严密，所以和其他学校相比，我们

学校民主气氛较浓，思想言论比较自由，学生之间相互研究新问题，接受新事物的空气较浓，所有这些，都为我们以后开展地下革命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我们在南乐简师读书时，中华民族正处在最危险的时候，日寇自九一八、一二九事变之后，继而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加紧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牌子，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进而准备成立华北自治政府，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在紧急关头，蒋介石政府坚持对外卖国投降，先后与日寇签订了“松沪”“何梅”“塘沽”等卖国协定，对内镇压人民，反共打内战，制造白色恐怖。1934年3月，国民党特务谎称我党河北省委开会，将南乐县委负责人陈仰贤、王同兴、宋同法三人诱骗逮捕，致使南乐县委被破坏，面对当时山河破碎、国家将亡的局面，我们处在华北国防第一线的南乐有觉悟的青年，无不为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忧心忡忡，抗日救国的情绪与日俱增。当此时，共产党员孙汉章同志（原系大名七师学生，1933年因闹学潮被反动学校当局开除学籍，党的关系转到南乐县委）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于1934年夏来南乐简师插班学习，以学生身份

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他经过深入细致地调查，了解了全校的情况以后，审慎地物色对象，用个别串联的方法，把我们思想进步的同学团结到他的周围。为便于进行革命工作，于1935年春，他在学校发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召集并吸收齐链、申怀长、王雨亭、焦崑、石一彬、张军直、张焕文等人参加，连同他本人共8人组成，后来又吸收了宋锡九、宋在久两名同志参加。这个“读书会”名义上是学生们自行结合的自学组织，实际上是党的外围组织，各成员听从党的指示，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接受并执行党的任务。“读书会”成员在孙汉章同志的领导下，在简师进步教员郭彩岑、邵汉三的支持下，联络南乐中心民校的进步师生王长祥、李渭川、郭镇封、王梅、王国华、贾振仙（后改名白潜）等，争取到南乐政教界一些上流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如简师校长李文华、县建设局长赵冠经等，向国民党反动当局进了一系列公开、合法或秘密斗争，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使南乐县委被破坏以后，党的活动并没有停止。

“读书会”的主要革命活动

“读书会”成员在孙汉章同志的领导下，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拯救中华民族，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根本目的的。为实现这一目的，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革命活动：

1. 有计划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革命的思想武装头脑。“读书会”从成立到结束，

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内（1935年春至1937年秋），有计划地组织和引导同学们学习了沈志运翻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伊里奇的辩证法》、艾思奇著《大众哲学》、李达著《社会科学概论》、列翁节夫著《政治经济学》、何幹之著《当前中国社会性质问题》、钱亦石著《中国怎样降为半殖民地》、李浩著《新教育学大纲》等书，并有计划的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大众哲学》《社会科学概论》《政治经济学》《新教育学大纲》等书，在我们据理力争和几位进步教员的支持下，被列入学校正规学习课程，取代了国民党教育部规定的《伦理学》《公民》《党义》等必修教科书。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我们受到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使我们认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现状，决心努力寻求中华民族解放的出路，为以后从事革命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2. 学习党的文件和方针政策，把自己的活动建立在党的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孙汉章同志经常教育我们要在严守党的秘密的情况下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当时，他领导我们有目的的学习了《农民土地问题指南》、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莫洛托夫《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报告》和《北方青年》等党内文件和小册子。我们学习之后就以交流学习心得的方式在同学和亲友中传播文件中的观点和主张，宣传

党的政策，交谈对时事政治的看法，启发他们起来革命，起来抗日。

3. 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努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我们这个“读书会”成立后不久，1935年冬，日寇策动了第二次华北事变，唆使汉奸殷汝耕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建立傀儡政权。国民党当局指派宋哲元，王揖堂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推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以顺应日寇“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并血腥镇压我党领导的北平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消息传来，我们“读书会”成员无不义愤填膺，立即组织同学走上街头，深入农村进行宣传，揭露日寇得寸进尺，企图吞并我整个华北，进而侵占整个中国的阴谋，声讨国民党当局向日本侵略者屈膝投降，和他们血腥镇压学生抗日运动的罪恶行径，并进行抵制、查封、焚烧日货的活动。我们的抗日活动获得了全县抗日群众的热烈支持和响应，推动了我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6年4月间，“读书会”成员开会议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伟大意义时，孙汉章同志说，党组织领导发动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党组织为了使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持续发展，在扩大宣传的基础上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为了便于联系校内校外的抗日群众扩大抗日活动，孙汉章同志提议在南乐简师建立“民先队”组织，首先把我们“读书会”成员吸收到“民先队”组织中来。从此，我们既是“读书会”成员，

又是“民先队”成员，一身二任，加强了同外界的联系，进一步推动了全县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

1936年夏，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与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梅治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按照这一协定，中国在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消息传出后，我们张贴标语，印发传单，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并组织同学上街示威游行，表示强烈的反对。

在全国人民反对《何梅协定》的高潮中，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纲领，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把这些电文油印出来，在全县高初小学中广为散发，扩大宣传和影响。并发动同学大唱救亡歌曲，齐樵、王雨亭从《中国呼声集》中选出“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上起刺刀来”等抗日歌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同年秋，孙汉章同志获悉国民党南乐县政府要逮捕他，迫于形势，不得不离校出走。临行前对“读书会”和“民先队”成员交待了三条任务：一是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二是讲究斗争策略、注意斗争方法；三是严守机密、遵守纪律、防止敌人破坏，并提出要面向工农，到工农中去开展斗争，建议焦崑、张焕文同志以寻找职业为由向学校申请退学，分别到工厂、农村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指定齐樵、申怀长负责联络和领导工作。

1936年冬，绥远抗战爆发，全国人民掀

起了巨大的援绥运动。当时，我们除开展宣传活动，自动捐款、捐衣以外，还在全县发动劝募和写慰问信，鼓励前方将士奋勇杀敌。正当绥远风云紧张，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之际，国民党南京政府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悍然下令逮捕了上海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仆、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一手制造了“七君子事件”，消息传出后，全国各界人士组织后援会，开展援救运动。我们以“学生会”名义，发动全校同学向上海报界写信，表示响应和声援。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举世震惊，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都对它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斗争十分复杂激烈。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内的亲日派疯狂叫嚷“讨伐张杨”，兴师动众，进兵西安，一场大规模的中国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党中央胸怀全局，高瞻远瞩，从中国的根本利益和民族大义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使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亲日派妄图策动打内战的阴谋，全国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党中央的这一英明决策，获得了全国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消息传来，我们积极宣传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号召全县各种政治势力，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1937年2月间，齐樵同志收到从党内传来的秘密材料，是我党揭露日本关东军司令松室良《满蒙政策上书》的有关内容，让“读

书会”和“民先”成员传播，在同学中进行宣传。“读书会”和“民先”的同志研究后，将其作为反面教材宣传抗日救国政策，宣传抗日救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灭华的狂妄野心。秘密材料的内容主要包括，对中国资源的详细调查，提出“如果日本不能掌握中国如此丰富的资源，想霸占世界是不可能的”；对国民党政府国防力量的分析说“国民党国防军二百万，军官都是为了升官发财，士兵都是招募的，官兵都没有爱国主义思想，也没有什么国防工事，不堪一击”；“唯陕北红军二十万，这二十万军队，经过十年内战，两万五千里长征，走过雪山草地，有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是日本皇军最大的劲敌，现在已到达陕北，与国民党达成停止内战协议，主张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如果不趁其立足未稳，趁其主张尚未实现，迅速进攻中国，如待其羽翼丰满，再想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当时我们几个人传阅后，也作为反面材料加以批判，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灭亡中国进而霸占世界的狂妄野心，宣传抗日救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启发大家抗日救国的觉悟，坚定抗日救国的决心，号召一切爱国的和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紧急行动起来，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民族生存而斗争。

（四）同国民党南乐县反动当局及其党羽、爪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6年春，王家麟任国民党南乐县政府县长后，提出了“剿匪”“肃共”等一连串反动政治措施，提倡“讲经尊孔”（美其名

曰“讲经救国”）和“新生活运动”。在全县高小以上学校增设经书课程，并由县政府直接聘请讲经大师，在全县机关团体、学校公教人员中讲授四书五经；还以“守望相助”为名，建立保甲组织，推行保甲制度。对全县高小以上学校学生实施反动的军事训练，用管制军队的办法管束学生，以期达到压制抗日、绥靖地方、巩固反动统治的目的。面对王家麟的倒行逆施，我们“读书会”的成员会同南乐县中心民校负责人白潜同志，联络发动全县各高小以上进步师生，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是在学生中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二是以学生会的名义到县政府提出质问和抗议，我们提出，抗战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只有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我们才能够生存，依靠讲经救国不啻南辕北辙，并提出，现在寇深祸急，亡国危险迫在眉睫，政府不动员民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天天让我们学拼刺刀呼喊“一二三四、杀杀杀”，到底是杀谁？在我们的联合斗争和抵制下，王家麟的反动措施未能顺利推行。

在与王家麟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也同其走卒和爪牙——国民党党棍魏瑞堂（当时任南乐县教育局督学、党部书记）、王子桢（1936年前任南乐民众教育馆馆长，后被王家麟擢升为一高校长，七七事变后当汉奸）、何举之（原为一高体育教员、后被王家麟擢升为一高校长、七七事变后当汉奸，任南乐县伪政府县长）等压制学生抗日运动，以奴化思想毒害学生的反动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王子桢、何举之等不学无术，根本

不知教育为何事，没有真才实学，而且人格下贱，品节毫无，野心勃勃，平时结党营私、巴结权贵，嫉贤妒能、中伤同仁，以期达到称霸南乐教坛，并进而实现青云直上窃据要津的目的，窃据一高校长后，紧步王家麟之后尘，大肆兜售“讲经救国论”和“新生活运动”，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四维八德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狂叫“学生应安分守己、不得侈谈抗日”，极力压制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不准学生谈论国事，学生稍有违抗，轻则训斥、重则以除名相威胁。对他们的反动行径，我们在全校师生中给予无情的抨击。1936年秋，在南乐、清丰、大名散发传单，对他们公开予以揭露，弄得他们声名狼藉，为教育界人士所不齿。

同时，与国民党鹰犬南乐县警察局进行坚决斗争。1936年夏，南乐县国民党警察在县西门无故搜查和殴打我校进步教员邵汉三，引起全校师生的极大愤慨，我们“读书会”抓住这个机会，运用“学生会”组织，发动全校同学上街游行示威，并结队前往警察局提出抗议，要求严惩凶手，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振奋了全校师生的革命热情。

1935年5月下旬，“读书会”成员齐樵从国民党县政府建设局长赵冠经处，得到一份国民党南乐县政府要在第二天逮捕一批我地下党员的名单，其中有王师韩、王国华、王梅、张子保、邵延壁、郭镇封等10余人。向孙汉章同志报告后，孙汉章立即召集“读书会”成员开会，指派“读书会”成员和进步同学郭化南连夜分别通知名单上的党员同

志立即转移，第二天南乐县反动军警全部出动，结果一个也未捕到，从而使南乐县党组织免遭一次重大损失。

支援盐民的正义斗争

1935年4月间，南乐盐民为反对国民党南乐县政府禁止他们淋晒小盐和盐巡对他们的敲榨勒索，继1932年至1934年的斗争之后，继续同国民党南乐县政府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向南乐县政府提出抗议，不许干涉他们淋晒小盐。对于他们的正义斗争，我们“读书会”给予积极的支援和帮助，认真修改完善印发告盐民同胞书，要“盐民齐心协力大联合”“谁要胆敢夺饭碗、和他拼命干干干”。

七七事变爆发后，投笔从戎，走上了武装抗日的道路

七七事变后，共产党员大名七师校长王振华，教务主任晁哲甫发起组织“冀南文化界抗日守土后援会”。南乐简师的进步教师郭彩岑、邵汉三、赵秉谦和学生自治会的常务委员齐桢、王雨亭、张军直、申怀长、石一彬响应号召，当即成立南乐简师分会，并立即组织宣传分队赴农村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第一支宣传队是由赵秉谦、齐桢、王雨亭带领，王志学打快板，赵步岳吹号，齐桢打鼓，浩浩荡荡奔赴谷金楼集一带村庄进行宣传活动。马运昌害怕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下令禁止“冀南文化界抗日守土后援会”开展活动。

8月上旬，党派人由大名来南乐召开教育文化界进步分子会，决定成立“抗日救国十人

团”，推选郭献瑞为团长，王国华、郭彩岑、邵汉三为副团长。我们“读书会”“民先队”的成员除已离校者外，都坚决响应他们的号召，同简师和各高小许多进步师生一起参加了“抗日救国十人团”，并根据组织安排，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反复阐明“只有抗战才能生存，只有实现全面抗战才能取得抗战胜利”的道理，号召群众特别是青壮年迅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去，起了很好的动员作用。

北平、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城市沦陷后，党中央提出了“发动游击战争，保卫华北”的口号，号召城市大、中学生和革命青年到农村去，与农民群众结合起来，在地方党的领导下发动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秋，中共直南特委书记刘大风同志来南乐、清丰一带，建立抗日武装，恢复党的组织，开展游击战争。经过一系列周密细致的组织和筹备，1937年10月在县西留固店村，建立了我党领导的冀鲁豫边区第一支抗日武装——河北民军第一路第四支队。在“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的号召下，原来的“读书会”成员齐桢、王雨亭、石一彬参加了筹备组织工作。之后，本班同学王继滋、王清晋等动员并带领部分青年作为第一批战士参加了这支队伍，走上了武装抗日的革命道路。宋锡九、宋在久、张军直、申怀长等同志在党的领导下，恢复和建立本县党组织，发展地下党员，动员农村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武装“四支队”，投入了武装抗日的革命洪流。

（原载于《濮阳党史通讯》1984年第2期）

白潜日记（1947年）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白潜始终保持着写日记的良好习惯。诚然，难免也有间断的时候，每当这时，他便严格地检查自己的疏漏。

约法三章

1947年元旦这天是农历腊月初十，距离农历二十三过小年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他在1947年日记本“前言”中，如此严格地解

剖自己：

我的日记过去的毛病是：

- 一、有时间断，采取补写的方式；
- 二、有时草率应付的态度，写几行字就算了。

白潜写日记不是记流水账，而是结合革命斗争的实践，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他在这篇“前言”中，给自己“约法三章”，明确今后写日记的目的，即：

一是为了检查自己，认识过去，我把日常生活及思想运动（认识）记载下来；

二是为了提高写作能力；

三是从平凡的生活中认识真理，逐日积累起来，成为系统的理论（认识），以便转变工作作风。日记的内容，过去多为流水账似的记事。这个内容仍然是很重要的一项，同时更应该注意的是对一个问题一件事情的分析研究，以及对某一个问题或事物的感想。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工作繁忙，环境艰苦，有时居无定所，甚至连顿



白潜去世前为了写回忆录使用的日记和笔记

热乎饭都吃不上，能坚持写日记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尽管如此，不管工作多忙，环境多艰险，白潜还是想办法抽出点时间，坚持把日记写下来。

他深有感触地写道：

在游击与工作繁忙的环境里，坚持写日记是困难的。我想除了在特殊情况下，一般的仍坚持每天晚上写日记。假定当时不能记的话，次日一定要补写，这就当作一条重要的制度吧！

白潜白天忙忙碌碌，难得有闲暇，而夜晚常常是提笔写日记的好时机。通过写日记，他那颗紧张繁乱的心绪沉静下来，认真地思考一天来的工作情况，检查自己的过失与不足。这个元旦的夜晚，他好不容易静下心来，梳理一下自己的思绪，记下了新春伊始的第一篇日记。



白潜的日记

一月一日

我知道的东西太少了，因此对有些问题或事情还不知道或不详细，并不是什么耻辱。而不想知道与详细了解一个问题或事情才是耻辱的。但是，我在这方面的努力较少。在日常生活中，对不知道的事情往往是以大概知道即可的态度表现出来。表面也像知道一点，实际并不大知道，又不敢说不详细，就胡乱答复与解说一气，这是不老实的态度。

白潜从革命工作与对敌斗争的实践中，深切体会到：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满足于一知半解，而沾沾自喜，是前进道路上的大敌。知不足，才能进取；知进取，才能不断前进，只有做到时时严格约束自己，经常检查自己的不足，永不停歇地向前、向前，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947年，白潜29岁。作为一个年轻的

领导干部，他十分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经常检查自己的欠缺，严于解剖自己，正视和改进不足，同时讲究领导艺术。这是白潜从多年的工作和斗争实践中学会和体会到的。

关于“领导艺术”，他在日记中谈到了自己的看法。

一月二日

一个会议一定要解决一定的问题，或者

贯彻一个精神，需要主要干部去亲自动员。听取群众的反映，也同样需要主要干部亲自参加。否则，大家就不愿提出意见，结果思想问题就不能解决。从这里看，负责干部到会的重要性。

但是，有的会议负责干部并不一定参加。一种是属于意见不成熟的会议，即便参加了，也做不出合理的决议（意见）来，反而影响干部的思想情绪。另一种情况是，主要领导参加会议并不解决问题，反而不如不参加。

大约这就叫领导艺术。

从参加会议这个习以为常的日常工作中，白潜领悟到了“领导艺术”的许多真谛。长期革命斗争的历练，使他养成了善于分析、独立思考的好习惯，绝不人云亦云。

平凡的哲理

白潜的日记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对经历过的事物进行解剖、分析，从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上找出不妥之处。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在思想上整理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进而指导以后的工作。这也是作为领导干部应当必备的基本素质。他在1947年几篇日记中写道：

一月三日

“要有思想准备”，这句话是我们常说的。“有准备”究竟有些什么好处呢？怎样才能做到“有准备”呢？这是个预见性问题。没有预见性，思想就无准备。无准备，就会慌张错乱。自卫战争开始以来，我们无准备，闹得很不好。后来好些了，是因为我们思想上有了准备。



白 潜

一月五日

一个人做了坏事情，是不愿意让人知道的。不知道，就不能让群众批评监视，因此改正错误也是很难的，因为他打不通思想。当然没打通思想，则依然如故，认为我没有什么可改造的。我们在整风中，提出坦白、反省，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一月六日

领导威信是从正确的领导中树立与提高的。有了领导威信，工作就好做一大步。即使有些地方认为不合适，可能也确实有不合适之处，只要能听取群众的意见，加上自己各方面的努力，很快就能克服的。

当没有领导威信时，正确的领导也会被人怀疑的，工作很难推动。这虽然不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在一定的时间里，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只要保持正确的领导，威信也是会逐步提高。当然，个别的别扭事是难免的。

一月十九日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做农民，不知道农民的切身痛苦。

我们在考虑问题时，往往站在问题之外去考虑。只是空洞的抽象的议论，很难解决问题。因此，只有站在问题之中，脚踏实地地工作，解决问题才能解决得圆满些。

二月七日

由于工作作风问题，或私生活问题，或其他对不住人的地方，或工作中的错误，由此而引起的骂声，是无可避免的。

不应对“骂”有丝毫仇恨的心理，而应该感谢这个“骂”，接受这个封建式的批评。不能幻想在今天的社会里，人们完全都是正确的批评。

二月八日

我讨厌事务主义、手工业式的领导作风。

有的人习惯于会议领导的作风，这不能说会议领导应该取消，而是应该把会议领导集体解决问题的方法做得更好。

除此之外，还必须注意争取可能的时间，与可能接近的同志进行个别谈心，才能达到兼听则明的目的。

在白潜大量的日记中，总能看到许多深刻的语言和颇有哲理的思想。他的日记总是与当日或当前的工作和思想实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一名领导干部每天的所思所想。同时，白潜善于从诸多烦琐、纷杂的事务中，加以思考、总结、归纳、提高、概括，然后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梳理出带有普遍性、

规律性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因此，这些看似平凡无奇的日记，对白潜当时和以后的工作有指导、有遵循，可避免走弯路，防止出现过去的失误和不足，取得了举一反三的自我借鉴效果。

闪光的镜子

白潜的日记，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严格律己，时时检查自己的不足。这种近乎苛求的约束，不止体现在对每天的工作上，还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渗透到生活的细节和通常人不易注意的细微处。他在 1947 年 3 月 3 日的日记中写道：

三月三日

上午许多同志来找，快 10 点时，太阳很好。看了几页《鲁迅全集》。吃饭时会餐，饭菜虽然不多，却有酒。因为今天没有事情，喝多了一些。其他同志也喝得多了，说话总是没分寸，走路时脚有些轻。

回来后即躺在床上睡觉，心里有些发烧，后悔不该多喝酒。接着有几个同志来，勉强说了些话。他们也可能认为我喝酒多了些。睡在那里，两次醒来，均天气尚早。当我起来叫通信员打水喝时，他说已半夜了，这我才睡的。这时并不想睡觉了，胡思乱想了一阵，慢慢就睡着了。

酒这东西，喝后使人精神受到刺激。但是，为什么又要喝酒呢？古时以饮酒为乐，有人认为“酒以解忧”“酒逢知己者饮”，也有“对酒当歌”者，还有什么“花天酒地”

“酒池肉林”……在外国，喝酒的更多了。据说德国人作战时，先喝醉了酒，然后冲锋。这样看来，酒这个东西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刺激神经，使你忘掉忧愁，忘掉疲倦，使你精神冲动起来；另一个作用，就是没有事情，喝了酒就睡觉，这就非有事不可。

我们革命者，时刻应该清醒。酒只能当作招待之用。我们不要冲动，也没有苦闷，更没有钱。

在一般人看来，逢友饮酒是人之常情，即使偶尔喝多一些，也无可非议。然而，白潜却想得如此之多，思索得这么广泛、深远。他从酒的用途，想到一个革命者对饮酒的正确态度，并且写进了日记里，用以自省。

白潜对工作和生活中的人和事，都留心观察，每一个纰漏都逃不脱他的眼睛，而且，肯于从思想、工作和生活上帮助周围的人。

三月三十日

有的同志当批评其他同志的时候，往往是非常“马列主义”的。只稍微以这个原则来检查自己，就会觉出有许多“特殊情况”是可以原谅的。就像一个医生，当他给别人看病时，总是这样说：这病并不重要，不会影响工作的，打针也没用，病慢慢就会好的。但是，一旦医生自己得了病，就非常关心自己，当然这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关系。谈到工作时，就觉得我的病与他不一样，请你谅解。这样是违背马列主义原则的。

对于这种手电筒似的“马列主义对外”的思想作风，白潜总是既坚持原则，又注意寻找

合适的机会，讲究说话方法，使人易于接受，又不丢面子。

白潜胸怀坦荡，豁达大度。这些在人们看来是“隐私”的日记，时常被别的同志看过，甚至被“抄袭”，但他从来也不介意，还大度地说：“同志们能够坚持记日记，（我的日记）如果能够起到好的影响，那就很好”。

三月二十九日

日记放在那里，总是不愿让人看，这就是自己思想上的问题。难以公开给大家，这也是“小资”的表现。其他同志也不应该看人家的日记。我的日记估计今天就有两个人看了，可能给他两个的印象：一、这人能够坚持记日记，如果能够起到好的影响，那就很好；二、内容不充实，也可能贻笑大方。不管如何，这是我生活的足迹，是为了检查自己，不是为了别人。

白潜的日记既是面闪光的镜子，又是个五彩缤纷的万花筒。日记里既记载行军、打仗、宿营、开会、读书，也记述爱情的甜蜜、生活的乐趣，还有离别的思念、人民的翻身解放、节日的愉悦、解放区的变化，是他几十年工作、学习、斗争的真实写照。

（原载于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永恒的信仰》；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清丰“六六讲话”的深刻启示与新时代价值

——在纪念邓小平清丰“六六讲话”发表80周年交流座谈会上的讲话

马洪涛

时间的坐标，因标注着时代华章而熠熠生辉；历史的长河，因激荡着奋进力量而奔涌向前。

当前，全市上下正扎实开展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值此之际，恰逢邓小平同志1945年6月6日在冀鲁豫分局群众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简称“六六讲话”）80周年。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举办本次以“邓小平清丰‘六六讲话’与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为主题的交流座谈会，旨在回顾历史、重温伟人足迹，从“六六讲话”历史文献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凝聚共识、提供历史启迪。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邓小平的一生波澜壮阔、光辉伟大，革命战争年代曾在濮阳一带工作战斗，其革命实践是光辉一生与军事生涯的璀璨篇章，影响深远，风范永存。他在濮阳地区的革命活动对中国革命

产生过巨大影响，永载革命史册；他的伟人风范如同一座丰碑，深深铭刻在濮阳人民的心中。

1945年1月，党中央指示加强冀鲁豫根据地工作，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同年3月，代理中共北方局书记邓小平亲赴冀鲁豫指导。经过深入基层调研，并与分局同志充分研究酝酿，在分局召开的群众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讲话的第一部分充分肯定冀鲁豫边区减租减息运动在中央路线指导下取得的成绩；第二部分深刻指出运动中存在的“左”倾问题（如伤害中农、消灭地主倾向、打击富农过重、斗争方式简单生硬等），并分析根源；第三部分针对性地提出九条指导性意见，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阐述群众工作的政策、方法，为边区群众工作指明了方向。

“六六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对群众工作的高度重视。“六六讲话”统一了边区干部的思想，提升了边区干部的政策水平。冀鲁豫边区的负责人段君毅、乔明甫晚年回忆邓小平的讲话，充满感情地说：

“邓小平同志对冀鲁豫群众运动提出的方针政

策，后来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对冀鲁豫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历史证明，广泛深入开展的群众运动，使冀鲁豫边区农村基本群众在经济上改善了生活，在政治上获得了民主和权利，使抗战的人力、物力、财力大大增强，边区各项建设事业得到蓬勃发展，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乃至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映照现实、折射未来。“六六讲话”所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做好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对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指导与借鉴意义。

启示一：弘扬求真务实作风

“六六讲话”基于扎实的基层调研与集体研究酝酿，是深入实际、掌握实情的典范。邓小平到达冀鲁豫边区后，不是急于提要求、做指示，而是首先安排北方局来的干部分3个组到老解放区濮县、滑县和新解放区濮阳县开展了一个半月的调查，深入了解不同地区群众运动中执行政策的成绩、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此后，与宋任穷等冀鲁豫分局领导人一起认真研究、反复讨论。

务实是谋事之法、成事之本。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党员干部“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和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形象，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求真”上下功夫，在“务实”上求突破，

在解决问题上取实效，坚持察实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以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精神破解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工作取得新成效。

启示二：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六六讲话”贯穿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当时，开展群众运动的总体目标，是贯彻中央土地政策指示，通过充分发动群众，紧紧抓住减租减息这个中心环节，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为有效发动群众，邓小平指出，必须立足当地内外环境条件与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教训，区分不同地区、不同阶级和阶层，采取针对性策略。强调要将运动严格限定在中央土地政策和斗争纲领允许的范围内，确保党中央政策的正确执行。

在不同历史时期，实事求是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攻坚克难、推动事业发展的关键法宝。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我们面临的问题更为繁杂，困难更为艰巨，形势更为复杂，这更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毫不动摇地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要自觉立足客观实际，深入探求事物内在规律，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坚决杜绝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确保各项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启示三：践行党的正确群众观与领导方法

“六六讲话”阐述了党的正确群众观以及党领导群众的正确方法。讲话充分肯定冀鲁豫边区党组织比较好地解决了群众观念、相信群

众的问题，克服了包办代替的毛病和恩赐观点，指出：这次运动“一般地说，克服了这个弱点，在干部中树立了群众观念，相信群众的自觉性和创造性，因此，运动表现了很大的群众性，成为群众自己的运动，形成了群众自己的组织，培养了自己的领袖，运动的规模之大之普遍，进展之快为前所未有”。讲话还提出党的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毛泽东所说的“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六六讲话”批评了将实行大胆放手与执行政策相对立的观点和做法，强调党制定的政策“不仅与群众的目前利益相一致，而且和群众的永久利益相一致”“群众常常容易看目前利益而看不到永久利益，这就需要党的领导”；提出领导群众的正确方法，是“站在群众之中之前”，而不是“站在群众之上之外”。

今天，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人民公仆意识，虚心向群众学习，汇民智、聚民心，把群众的意见建议变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扎实加强社会治理重要要求的实际工作中，要主动作为，从社会治理实践中总结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规律；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精准施策，把工作做细做实；大胆干事、树立威信，支持群众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治理问题。

启示四：坚守党的群众路线生命线

“六六讲话”强调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深刻阐述了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从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到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再到如今广大党员干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基层治理、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担当作为、服务群众，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群众路线始终是永葆党的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

今天，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全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的“必修课”。广大党员干部要带着热情联系群众、带着真情融入群众、带着激情服务群众，把心系群众、情系百姓体现到履职尽责全过程各方面。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

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濮阳大地留下的光辉足迹和宝贵文献，是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的生动教材和丰富资源。希望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市人民以此次座谈会为契机，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和实践，继承和发扬他的革命精神，聚焦“两高四着力”，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作者单位：濮阳市政协文化和文史委员会）

以濮阳地区干部南下研究为例 浅谈党史专题研究

王自伟

党史专题研究是以党的历史上某一个方面的工作或某个重大活动、重大决策、重大运动、重要会议、重要政策为选题，全面征集记载反映这一选题事件的历史资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鉴别整理、分析研究，理清选题发生的历史背景、发展的历史进程、相关事件的内在联系，以及选题事件发生发展的经验、规律、启示，是立准立好史料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也是深化党史研究和编写地方党史正本的重要基础。

党史专题研究具有资料性、系统性、完整性、客观性等特点，致力于全面搜集和整理与选题相关的历史资料，确保研究的资料性和丰富性；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出发，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确保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入性；力求呈现选题事件或政策的全貌，确保研究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力求还原历史真相，为后人提供准确的历史借鉴。

结构上基本采用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的方法，常用的有三种结构形式：一是纵向三段式结构，即按照历史的发展过程，把文章分为背景（原因）、经过（内容）、结果（影响、经

验教训）三部分，比较适合于历史事件和会议等专题写作。二是横向研究结构，即将某一个历史问题从各个侧面加以分析、阐述，或对复杂的问题作逻辑的概括、综合性的阐述，比较适合于对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专题的写作。三是纵横结合结构，即在写作中既注意从不同地侧面作横向的论述，又注意到历史的发展过程，适合大部分专题研究。

一、确定专题方向，广泛搜集资料

专题研究方向确定的原则，一是突出党在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研究方向要服务中心；二要突出地方特色，从纵向（本地这一时期与另一时期对比）、横向（本地与其他省、市、县对比）的比较研究中找准特色，或者从全党全国普遍开展的工作、运动在本地的典型表现（或有代表性、影响较大的事件）中寻找特色。

作为市县一级党史方志部门，题目不宜太大、太笼统，应该具体以便于突出重点，时限、内容上也便于把握。濮阳作为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

有很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大贡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如大革命时期南乐佛善村党支部建立、中共濮阳特别支部成立，土地革命时期温邢固农民斗争、盐民斗争、姚家暴动、教师增资罢教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斗争、民主民生斗争、减租减息运动、1942年抗灾救灾，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挺近大别山、濮阳人民踊跃支前、华野整军、组织干部南下西进等。从濮阳地区干部南下研究这个专题方向看，一方面突出了当时广大新解放区急需干部接管建政的主要任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濮阳地区干部贯彻中央安排在全国解放中的突出贡献。

资料搜集是党史研究的基础，要写好一个专题，必须占有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包括档案、报刊、日记、信件、标语、布告、传单、回忆录、专著、论文、方志等等。为了写好这一专题，先后查阅了《中国共产党濮阳市历史》（第一卷）《中共濮阳市党史大事记》《中共濮阳历史简明读本》《濮阳市志》《濮阳历史

大事纪年》《濮阳红色记忆》《范县志》《台前县志》《濮阳之光丛书》《南下纪念册》《清丰县红色印记—南下》《南乐县红色记忆—南下》《回顾贵州解放》《苗岭圣火 光照千秋》等书籍，并从市档案馆复印了南下干部思想动态、关于南下干部的报告等档案资料，初步理清了脉络。

这里要提到志书编纂的资料长编，所谓资料长编是在编写志书前，把搜集来的各种资料按志书的体系编辑而成的汇辑。通过资料长编的形式对干部南下材料进行删节、筛选等初步加工，按照专题的框架进行编排，粗具初稿的轮廓，便于进一步完善。

二、坚持唯物史观，交代专题背景

唯物史观是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的根本方法，唯物史观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去认识历史，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对事物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论断。例如，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

上毛泽东主席提出，“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0000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当时，党中央对全国解放形势的判断



中共直南地委欢送南下干部支援新解放区合影

还处于国民党政府还有一定的抵抗力量，军力对比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需要用四到五年时间才能彻底解放。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政府已无力进行有效的战略防御，其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等地，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从这点看，不能说九月会议的决议有问题，而是形势变化太快，国民党政府溃败速度超乎想象。

专题背景指事件发生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历史条件，只有把当时的历史背景搞清楚、写明白，才能对我们要叙述的历史事实作出合理的铺垫和说明，才能反映出事件发生和存在的客观依据，揭示出它的历史必然性。写背景既不能太简单，一笔带过，说不清问题，又不能太繁琐，挤占专题的主要内容。要做到开门见山，简明扼要，紧扣主题。例如，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作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共约5.3万人左右。华北1.7万人。”10月29日，华北局作出《关于外调17000干部及补足干部缺额的决定》，“北岳、太行、冀中、冀南、冀鲁豫5个区党委，各配齐一个区党委架子。”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华北局除八千干部外，其余所担任抽调之全体干部均应准备随林彪、罗荣桓南下，使用于湘、鄂、赣三省及两广方面。须于三月底集中并训练完毕。”1949年1月8日，冀鲁豫区党委就南调干部问题召开地委组织部长扩大会议，主要解决南调干部和干部外调后组织调整、今后培养提拔干部问



群众为南下干部送花

题以及组织部门的工作问题。2月5日，《冀鲁豫区党委就南下工作给各地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已批准南下县委应立即宣布。各地委南下干部务于2月28日整队到菏泽晁八寨集中，以便整训学习。”冀鲁豫区党委分解到所属地委的抽调干部任务是：九地委组成1个地委机关干部框架的五分之四，以及4个县、28个区的干部框架，共437人；八地委组成1个地委机关的干部框架，以及4个县、35个区的干部框架，共521人。当时，范县、濮县、寿张（今台前县）、阳谷、朝城、观城县属九地委。昆吾、濮阳、清丰、卫河、南乐、内黄、尚和县属八地委领导。通过这样的背景交代，既点明了中央和华北局的部署、决策和总的形势，写出进行干部南下的大背景，又交代了冀鲁豫区党委的具体情况。

三、注重抽丝剥茧，辨疑存真去伪

真实永远是党史研究的生命，但党史研究的对象毕竟早已时过境迁，无法百分之百的准确重现，加之许多档案文献对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的记载又时常会有差别。因此，在研读资

料时就要小心谨慎，不能轻易相信二手材料，要反复比较资料异同，只有经过仔细阅读，反复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有可能呈现相对真实可靠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于当事人口述史、回忆文章，要有相关的资料支撑，个人回忆终究有其主观因素和记忆力衰退的影响，不易准确完整。例如，濮阳县南下纪念碑中记载，濮阳、尚和、昆吾各队分别奔赴江西赣东北地区都昌、波阳、鄱阳等县进行建政接管工作。波阳和鄱阳一字之差，但通过网上查询，两者实为一个县，1957年5月因为规范生僻字才改鄱阳县为波阳县。通过其他资料可知，当时中共鄱阳地委决定鄱阳县、市分建，城内新建鄱阳市，鄱阳县机关驻磨刀石，南乐县五中队与昆吾县四中队合并接管鄱阳市，六中队（尚和、内黄县）接管鄱阳县，且陈桐源兼鄱阳市长，王涌波任副市长，鄱阳县委书记张悦斋、县长史可鉴。由此可以看出波阳应为鄱阳市。又如，清丰、南乐县出版的南下一书中《南下、西进支队随刘邓大军到新解放区开辟工作进军路线图》在赣东北接管时标注二大队（地委）接管鄱阳地区，根据其他资料作证，此应为一大队，因为二大队负责接管上饶地区。回忆文章《回忆1949年接管鄱阳县建立政权开展新区工作的斗争》中记述八大队六中队，该中队由尚和、内黄两县组成，实为一大队六中队，为何会出现这种偏差，因为当时内黄、尚和县属八地委领导，回忆时误将八地委表述为八大队。再如，据回忆文章1949年11月24日冯福申率队到达贵州开阳县，而根据《贵州贵定地区党史资料》显示应为25日，在此应以党史资料为主。

四、汲取正反启示，总结历史经验

写经验、教训，要准确实在、恰如其分，要围绕专题反映内容如取得重大成就、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或者严重恶果、造成重大危害的原因，就事论事为主，适当延伸并展开评价，要以对材料的占有、把握为基础，不能随意和想当然，要有直接的史料支持。例如，贵阳地区解放初期，国民党武装纷纷缴枪投诚，社会秩序比较稳定。但是不久，驻贵州解放军主力奉命入川参加川西会战，整个贵州省仅留1个军守备，两个月后虽然调回了两个师，但加起来总兵力也不超过5万人，参加接管和维护治安的兵力大大减少。而敌人根据其应变计划潜伏下来的反革命组织，也开始蠢蠢欲动，特别是一些国民党部队通过假起义保留了大批精良武器。另外，存在一定的轻敌麻痹思想，以为西南战争已经结束，可以高枕无忧，有的县仅保留1个排驻军，照搬老解放区、游击区工作经验，对边远山区土改工作队大都安排班一级护卫；在群众没有充分动员的情况下，将广大乡村、重要交通线交给地方武装守备，导致土匪突然兴起后，交通干线大多瘫痪、城乡联系基本断绝。全区土匪由2400余人猛增至14000余人，枪支由2000余支增至8000余支。全区已解放的10个县城，先后被围攻的有7个县城，3个县的党政机关以及干部还曾一度撤出，牺牲干部上百名，这就是血淋淋的教训。为了应对匪患，贵阳地委召开军政干部会议，传达省委指示，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匪情，确定对策，使剿匪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地、县、区、乡以各级党政领导同志为首，吸收当地驻军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参加，建立剿匪委员会，

在党委统一部署和指挥下，有计划地开展剿匪斗争。组织武工队或工作队，和省军区组织的武工队、工作队，深入农村基层，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群众性的剿匪运动。建立农协会、民兵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在广大农村形成天罗地网。在策略上，集中打击向我党进行武装骚扰的土匪，采取拂晓包围的方法，一举全歼。同时，掌握和利用土匪内部矛盾，争取瓦解匪众，孤立匪首，对首恶分子及时予以镇压，对胁从分子则号召投降自首，争取宽大处理。省委、省军区在全省范围内集中主要力量，组织合围战斗，给主要土匪以歼灭性打击，使全省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到1951年上半年，骚扰贵阳地区的土匪基本消灭干净。

五、善用数据事例，丰富史实人物

胡乔木曾说过：“党史要多讲史实，因为历史就是由事实构成的，观点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写事件情节，要朴实无华，忌讳过分描写，事件的情节是事件真实性的具体表现，写事件情节，要根据事件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况如实叙述，用朴实的语言把事件的真实情况交代清楚就行，不要人为的虚构历史情节或使用花哨的语言对事件的细节做过分渲染。例如，南下支队4月21日从桐城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原定的渡江地点急进，4月24日到达长江北岸安庆，4月26日支队全体分批奔赴渡江口岸，登上浮桥，队员拉着手、扯着衣服紧随其后，伴着浮桥不停地起伏摆动，小心翼翼地迅速渡过长江。通过不同时间节点描写了南下干部渡江情况。又如，濮阳地区西进干部首先对城乡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大力开展宣传工作。抽调干部组织宣传队（组）深入区、乡

镇、农村进行广泛的宣传，贴布告、写标语、召开各种会议，讲形势、讲政策，戳穿敌人的谣言，揭露敌人的罪恶，表明我党的态度。经过一段形势政策宣传之后，情况逐渐好转。通过采取的措施描写宣传工作开展。

写历史人物，要客观公正，以事联人，事实充分，切忌随意褒贬，张冠李戴。例如，3月18日，息烽县委书记王涌波到本县天台寺剿匪途中，被1400余土匪伏击，他率领50余名干部据守轿子山头，与敌血战，壮烈牺牲，时年33岁。3月19日夜，修文县乌栗区政府被土匪围攻，区委书记王本彰及其他4个同志牺牲，区武委会主任孙三保一人坚守阵地与敌斗争，直至20日下午5时，解围部队到达，才把土匪打退。通过具体人物，反映了匪情严重，同时也彰显共产党员不怕牺牲的精神。

六、突出党史姓党，深挖精神实质

党史专题研究反映的主要内容是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计划等的制定及其贯彻实施的情况和结果，体现明确的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政治路线、政治目的，是政治要素的组合，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因此，在记述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历史事件为出发点，紧紧抓住这个历史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善于区别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反对客观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特别是写一些问题，要注意角度。例如，冀鲁豫区作为老解放区，党组织机构健全，干部队伍整体素质较高，群众基础、经济基础较好，而新解放区国民党残余势力仍在疯狂反扑，土匪恶霸尚未肃清，加之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适应等客观条件，少数农民出身干部存在畏难情绪。如乡土

观念、地方观念，个别的还存在“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封建落后思想，国家观念、组织观念模糊；土地平分后有了生产资料，发家致富的思想上升；有一部分工农干部感到自己无前途，不如知识分子，进了大城市也适应不了，不如现在回家，免得将来老了无人管；存在着愿北上不愿南下，早走不如晚走等思想。为完成这次干部南下工作，从冀鲁豫区党委至地委、县委，层层组织发动，加强政治教育、阶级教育、党的纪律教育，加强对干部的组织管理，强调组织纪律性，克服乡土观念、地方观念。同时，适当解决被调干部存在的实际困难。对拟调干部进行了调查分析，确定哪些干部可以外调，哪些干部不能外调，哪些干部应在原地坚持工作，对被调干部的家庭生活问题、生产代耕问题等都有明确的安排，解除了被调干部的思想顾虑。这里需要注意，一些与专题主题相违背的材料可以舍弃，例如，档案资料平原省委组织部关于南下干部逃跑问题处理的指示。

写事件的意义或启示，要围绕专题反映内容对现实和未来，对本地和全局的作用、影响等方面去分析研究，就事论事为主，要有理有据，善于总结拔高。例如，濮阳地区南下西进支队的全体成员，从冀鲁豫区到赣东北区开辟工作，又过长江、越雪峰山、进苗岭到贵州高原，克服了进军路上的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任务，为实现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孕育了闪着光辉的南下西进精神。主要表现为：觉悟高。南下西进是革命的需要，是人民的需要。广大濮阳地区干部，有的刚组建家庭，有的刚分到土地，有的刚安排了工作，南下西进人生地不熟，

生活不习惯，但一旦革命需要，党有号令，他们立即自觉牺牲个人利益，服从调遣，奔赴南方，冒着敌机轰炸、敌军和土匪的袭击，去迎接新的战斗。纪律好。广大濮阳地区干部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需要南下赣东北就奉命接管赣东北地区，需要西进大西南就随军接管贵州，大多数干部工作都变动过若干次，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党分配到哪里干部就到哪里，不讲价钱，不打折扣。行军途中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作风硬。广大濮阳地区干部在行军接管途中，每人每天一斤半米、五钱油、三钱盐，每人要背三四十斤重的枪支、子弹、给养、被褥、衣服，平均每天行军70余里，早晨五、六点钟起床出发，晚上八、九点钟宿营，南下途中正值雨季，一个多月时间冒雨行军，相当多的同志出发时的布鞋损坏，不得不赤足行军，西进时爬山涉水过雪峰山，接管时群众讲话听不懂，水土不服，人少任务重，但吃大苦、耐大劳、不怕流血牺牲，胜利完成任务。讲奉献。广大濮阳地区干部为新解放区稳政权，为他乡人民谋幸福，宣传党的政策、培养本地干部、扩建地方武装、征粮支前、抗洪救灾、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开展土改、发展经济，融入当地社会，把新区当成故乡，把人民当作亲人，把对故乡和父老乡亲的爱与情，无私地献给了新区和那里的人民，贡献了青春献壮年，贡献了自己献子孙，大忠大爱大孝大义永传人间。

（作者单位：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濮阳乡贤赵廷瑞和他主修的《陕西通志》

周进鹏

明代陕西，统辖今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全部及青海、新疆、内蒙古三省区部分地域，是祖国大西北边疆治理、民族交往和军事斗争的一线重地。濮阳“八都三尚书”之一、明嘉靖时期的乡贤赵廷瑞，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衔，曾巡抚陕西三年，“民物康阜，边陲晏然”，受到朝廷嘉奖。其间，他主持编修的嘉靖《陕西通志》，是陕西乃至大西北现存最早的一部省级一统志，成为明中期以降成

边稳疆、教化一方的施政参考，也为后人了解研究、开发建设祖国大西北提供了历史文献。

—

赵廷瑞（1492—1549），字信臣，号近山，后又以州治东南有洪洋山名号洪洋、洪洋山人，明直隶大名府开州（今河南濮阳县）人。据《开州天水赵氏家谱》，开州赵氏为宋太宗后裔，以甘肃天水为郡望。赵廷瑞五世祖赵允明随朱元璋参加元末农民战争，明初由安徽凤阳定居开州，成为立户始祖、名门望族。

赐进士出身、兵部尚书赵锦为其撰写的墓志铭载，“公生而敏悟，日记数千言，总角（指幼年）入郡庠即迥出流辈。督学



府谷县档案馆馆藏《陕西通志》

浚川王公见公文大异之。”明正德八年（1513），赵廷瑞与同乡刘珂、王纪、申锜、许伸同中举人。明正德十六年（1521），与同乡王纪、王世爵同登进士榜，列二甲12名，选入翰林院庶吉士。

嘉靖元年（1522），授户科给事中。后，历任刑科给事中、通政司右通政、南京太仆寺卿、光禄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户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南京户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赵廷瑞军功卓著、地位显赫，是明代开州在中央、地方重要岗位任职最多的乡贤。

其叔父赵昂，曾任山东博平（今茌平）知县，因办事公正、执法严明，被当地百姓誉为“铁耳主簿”。受叔父影响，步入仕途后的赵廷瑞气节盈怀、不惧权贵，对不法官官，兵部、吏部、刑部德不配位、违法抗律的官吏，甚至包括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因“大礼议”得宠的张璁，敢于上疏直言，“一时直亮之声著于中外”，“闻者惮之”。他的忠直无私“大著风采”，得到朝野好评，受到朝廷重视，这也成为其进阶升职、担负大任的重要原因。

嘉靖十八年（1539），赵廷瑞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并巡抚陕西地方。这是他作为朝廷大员到地方任职。明正德后，巡抚成为实际上的地方最高长官。其时，鞑靼军队时常威胁陕北。“公与总督军务兵部尚书松石刘公，议定方略，大致克捷，斩获首级至一百三十二颗，中有酋长二。疏闻，上大悦，进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仍巡抚其地……在镇三年，屡奏虏功。辛丑（1541），上遣行人张汝隆赉赐白金彩币及敕谕钦奖。公以宠遇优隆，

益加策励。”

明清时期多部《开州志》为其立传，称其“多懿行”，“以勤敏受知世宗，加太子少保”。州治大街南，曾为其立有辛巳进士坊、都谏坊、银台坊。

二

在陕西巡抚任上，赵廷瑞感到长期固边守疆，需要军政长官熟悉地情人文，更需要经常教育感化民众，这也是开展政治军事斗争的必要条件。发挥地方志资政、教化职能，编纂《陝西通志》遂提上日程。

赵廷瑞对编修地方志并不陌生，并有独到见解。嘉靖十三年（1534）10月，开州知州孙巨鲸主修，赐进士出身、开州“八都三尚书”之一、时任河南提刑按察使司副使王崇庆总纂的《开州志》告竣。时任通政司右通政的赵廷瑞受孙知州之邀为之作序，并有《龙湫赋》入志。在序中，赵廷瑞盛赞家乡志编纂这一德政善举，“盖古史在列国咸具。今郡邑，古列国，而志，史也，其曷可以弗葺也？且夫丽往逖于不陨，贻法戒于方来，而吏治、人文缘之考见，胥于志焉赖……一方文献所关，非寻常簿书期会可班者。故是举也，成之甚力云。”

陕西史志编纂源远流长。周代即有“记言”“记事”的左史、右史，以及“掌道方志”的诵训、“掌邦国之志”的小史、“掌四方之志”的外史等专职史官。汉代有《三秦记》《三辅黄图》等名著问世。唐代有朝廷主持编纂的全国性地理总志《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宋代有吕大防《长安图记》、宋敏求《长



陕西通志

安志》、程大昌《雍录》。元代有骆天骥《类编长安志》、李好文《长安志图》等。

明成化十一年（1475），陕西巡抚马文升主修、提学副使伍福主持编纂的30卷《陕西志》刊行，这是陕西历史上第一部通志。赵廷瑞考察发现，明成化《陕西志》“顾今阅七十年，板佚其半，即秦城巨家，亦罕有其书矣”，“古者列国有史，陕西可无志乎？古之列国，今陕西诸省也。今之志，古史之流也。其必有良史之材乎！”残志断篇的境况，与陕西地位几不相称，也给地方治理带来诸多不便。

“修史之难，无出于志”。志书能否编纂成为一代名志佳作，关键在于选聘文史功底厚、协调能力强、有身份地位、熟悉热爱地情的本地人担任总纂。嘉靖二十年（1541）早春，赵廷瑞利用“行县”机会，前往所辖三原县（今

属陕西咸阳），与著名学者马理谈及纂修《陕西通志》事宜。马理，三原人，字伯循，号溪田，正德九年（1514）进士，官至南京光禄寺卿，在吏部任上敢于直言进谏，被誉为“真考功”，告老还乡后开坛讲学、著书立说，与宋代理学家张载齐名。马理表示赞同并向赵廷瑞推荐好友、高陵籍著名学者吕柟共襄此举。吕柟，字仲木，号泾野，正德三年（1508）状元，多次因言获罪被贬，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著名理学家。赵即往高陵，“请于泾野，可之”。相同的科考宦历、共同的志趣使命，使三人意见很快统一。赵廷瑞随即主持召开监察御史、三司长官参加的专门会议，协商、部署编纂事宜，聘马理、吕柟二人为志书总纂。二人“卜竹林祠（纪念宋代名臣寇准所建莱公祠）为馆，各率从游之士，载所藏群书，肇纂述之事”，“首标义例，拟议攸同，乃分类限域，交尽所长”。工作开展几个月后，吕柟以母病、母故辞归，后又身染疾病，“竟伤不起”，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七月病逝。“是志也，盖多出溪田先生之手。”

三

自嘉靖二十年（1541）三月六日诸位参与编纂人员“就馆”着手开展工作，至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一月十五日编纂完成并“散馆”，《陕西通志》编纂历时约一年九个月。志稿完成后，“效（献给）之当路诸大君子，求斤正云”，后经校正付梓。

当卷帙浩繁的《陕西通志》初稿呈送审校时，赵廷瑞被这部鸿篇巨著所震撼。他力邀陕

西巡按御史周南、陕西按察司副使王邦瑞、总纂马理、吏部文选司郎中王九思为该志作序，陕西耀州富平县学训导周文翰作跋。他终审志稿并慨然作序，发出“斯其为陕西通志也已”的感叹！

《陕西通志》共40卷，分土地、文献、民物、政事4纲，28目，约190万字。正文设星野、山川、封建、疆域、建置沿革、河套西域、圣神帝王遗迹、古迹、圣神、经籍、帝王、纶綺、文献、名宦、乡贤、艺文、户口、田赋、物产、仙释、职官、水利、兵防、民政、风俗、灾祥、鉴戒等目，按嘉靖时陕西行政建置，分述西安、凤翔、汉中、平凉、巩昌、临洮、庆阳、延安等府。另有天象、地理、山脉、河流、城池、物产等附图200余幅，在历代各种陕西志书中久负盛名。因明代陕西境域辽阔，该志实际上也是一部具有“西北通志”性质的著述。

赵廷瑞在序中回顾了修志背景、编纂经过、志书特色、功用价值，认为该志匡守初心、选材精良，不同于以往志书“征求异闻，采撷群事，自谓能成一家之言，然不失之烦芜，则失之陋略，甚者私徇笔端，缘情裁削；文词苟炫，信后为艰；刊布未几，辄受嗤于人”。赞誉该志“譬之萃众腋而成珍裘，合群材以构华屋，斧凿无迹，剪制自如”，“其旌善，虽微必书，否则，虽有爱而必捐（抛弃）”，“其论叙多儆敕之词。其载事，星躔河岳，上下古今，括囊殆尽”，“考索之精，虽史传宿讹，亦多是正。艺文无繁富之嫌，政教贻官师之则”。对志书的利用，寄予很大期望：“足以完既废之典，以诏方来。继自今生于斯、宦于斯者，取

而观之，全秦之故，毕陈于目前。其于民俗政体之助，岂其微乎？”

嘉靖《陕西通志》体例严谨、记事详确。周文翰在跋中称：“兹志也，搜采人物，阅极经史及古今诸志、名世之集，虽断碣残碑，罔敢轻弃，其隐德幽贞，或遗于文人辞士之外者，又率得于先生（指马理）之见闻，取善可谓广矣；纪述事类，则凡旧志讹且漏者，皆考订增入，纲举目张，纪事可谓详矣；简帙则省旧志之半，而事则倍之，编叙可谓博且约矣。”王邦瑞评价该志“不直为陕西志也，故曰通天下之志。是故观于《通志》，其事则纪乎陕西，通乎天下，其文则经籍，其义则宗之孔孟氏，於戏至哉！”《陕西通志》详载西北地区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变迁，注重记述不同时代先人的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还专卷记述当时不属于明朝政权管辖的河套、西域地区，并绘制河套图、西域土地人物图。

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陕西三原县图书馆等藏有嘉靖刻本。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曾编纂出版其点校本。嘉靖《陕西通志》保存了大量明代及其以前西北地区史料。随着研究的系统深入，相信这部弥足珍贵的资料文献将会在大西北开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澶渊之盟：北宋的盈亏之辨

王淑宁

公元1005年初，宋辽签订澶渊之盟，这一事件在中国古代史中影响深远。它终止了宋辽长期的战争状态，开启了双方相对和平的新局面。然而，关于北宋在这一盟约中究竟是亏是赚，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从表面看，北宋输送岁币似为屈辱与损失，但深入探究其历史背景、盟约内容及后续影响，会发现情况复杂得多。全面剖析北宋在澶渊之盟中的得失，对准确理解北宋历史及宋辽关系演变意义重大。



宋辽订立“澶渊之盟”的见证——回銮碑

一、澶渊之盟的背景

(一) 北宋初期的局势

北宋建立于五代十国的混乱之后，初期面临内忧外患。内部，自唐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严重，历经五代十国，地方藩镇掌握军事、财政、行政大权，严重威胁中央政权。宋太祖赵匡胤采取系列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如“杯酒释兵权”，据《宋史·石守信传》记载，赵匡胤以此解除武将兵权，将军事权力集中于中央。同时，在行政上设三司、枢密院等分散宰相权力；财政上设转运使，把地方财政收入转运至中央。这些举措虽消除地方割据隐患，但造成

官僚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经济上，长期战乱使社会经济遭受重创，农田荒芜，水利失修，百姓流离失所。北宋政府为恢复经济，推行鼓励农业生产政策。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政府鼓励垦荒，对开荒农民给予免税优惠，还大力兴修水利，如疏浚黄河，改善灌溉条件，促进农业恢复。但经济复苏缓慢，短期内难见显著成效。

外部形式方面，北宋面临强大的辽国威胁。辽国在五代崛起，占据燕云十六州，此地地势险要，是中原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屏障。北宋失去燕云十六州后，北方边境无险可

守，辽国骑兵可长驱直入。宋太祖曾想收复燕云十六州，却因统一南方各国而搁置。宋太宗两次北伐辽国均失败，尤其是雍熙北伐，宋军损失惨重。《辽史·圣宗纪二》记载：“三月庚辰朔，宋遣曹彬、崔彥进、米信出雄州道，田重进出飞狐道，潘美、杨继业出雁门道来侵，岐沟、涿州、固安、新城皆陷。”“夏四月辛丑，耶律斜轸败宋将杨继业于朔州，擒之。”“五月庚午，辽师与曹彬、米信战于岐沟关，大败之，追至拒马河，溺死者不可胜纪；余众奔高阳，又为辽师冲击，死者数万，弃戈甲若丘陵。”辽军在此役中重创宋军，此后北宋对辽转为守势，加强边境防御。

（二）辽宋冲突的升级

辽军凭借骑兵优势，频繁侵扰北宋边境，主要集中在河北、山西等地。这些地区人口密集、农业发达，却因辽军掠夺和破坏，百姓生活困苦，农业生产受损严重。《宋史·太宗本纪》记载，“雍熙三年（986年），辽军入寇，边将失利，诸州多被其害，百姓流离失所”。辽军烧杀抢掠，使当地经济陷入困境。

北宋为应对辽军侵扰，一方面在边境大量增兵，加强防御力量；另一方面修建众多城寨、堡垒等防御工事，如在河北地区修筑城堡和烽火台，形成防御体系。但这些措施耗费巨额军费，北宋每年军费开支高达数千万缗，对经济尚未完全恢复的北宋来说，是沉重负担。同时，长期战争使北宋军事力量削弱，士兵疲惫，士气低落，“更戍法”又让军队频繁调动，将领与士兵缺乏默契，影响战斗力。而辽国骑兵机动性强，善于野外作战，在军事上占据优势。

随着冲突升级，双方都深陷战争泥潭，百姓渴望和平，统治者也意识到和平谈判的必要性。

二、澶渊之盟的签订过程

（一）辽军南下与北宋应对

1004年，辽圣宗和萧太后率二十万辽军南下，直逼北宋东京。辽军一路攻城略地，北宋边境州县告急，东京朝堂一片恐慌。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陈尧叟建议迁都成都，以避辽军锋芒。关键时刻，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抵抗，并力劝宋真宗御驾亲征。寇准认为“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轶之势，我得胜算矣”。宋真宗最终采纳寇准建议，决定亲征，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北宋军民情绪，鼓舞了士气。

（二）澶州之战与议和契机

宋真宗亲征后，宋军在澶州与辽军对峙，展开激烈战斗。澶州地处黄河要冲，是东京重要屏障，战略地位关键。宋军凭借城防多次击退辽军。战斗中，宋军使用床子弩，据《武经总要》记载，这种武器能发射巨大弩箭，射程远、威力大。辽军主将萧挞凛在视察地形时被宋军床子弩射中毙命。萧挞凛是辽军重要将领，他的阵亡沉重打击了辽军士气，辽军陷入混乱。此时辽军深入北宋境内，后勤补给困难，且宋军援军不断赶来，辽军处境危险，于是产生议和想法。北宋方面，宋真宗虽亲征但畏惧辽军，长期战争也给北宋财政和百姓生活带来巨大压力，降辽旧将王继忠在宋辽间牵线，双方逐渐达成议和共识。

(三) 盟约内容的敲定

经过多轮谈判，宋辽签订澶渊之盟。主要内容包括：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真宗尊萧太后为叔母，宋为兄，辽为弟，体现政治上相对平等；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即“岁币”，这看似是经济负担，也可看作北宋换取和平的代价；宋辽以白沟河为界，双方撤兵，互不侵犯，明确了边界；双方在边境设榷场，开展互市贸易，促进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二十多年的战争，开启相对和平时期。

三、北宋之“亏”的分析

(一) 经济上的直接损失

北宋每年向辽输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岁币，是一笔巨大开支。按当时物价，三十万匹两绢银价值可观，据史料记载，北宋给辽国的岁币加起来约有四十万两银子。这些财富若用于国内，可投入经济建设，如兴修水利、改善交通，也可用于社会福利，如救济灾民、扶持贫困百姓。但岁币输送给辽国，影响了北宋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且岁币支出有持续性和递增性，历史上北宋曾增加岁币数额，后期增加绢银到五十万匹两，进一步加重财政困境，削弱北宋经济实力。

(二) 军事战略的失利

澶渊之盟使北宋失去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最佳时机。燕云十六州作为中原重要屏障，北宋此前虽多次战败，但仍有收复希望。澶渊之盟后，北宋承认辽国对燕云十六州的占领，放弃武力收复计划，军事战略转为守势，专注边境

防御。失去燕云十六州后，北宋北方边境无险可守，辽国骑兵易突破防线，北宋不得不大量增兵边境，修建防御工事，耗费巨额军费和人力、物力。军事战略的被动使北宋军事处于劣势，难以有效应对辽国威胁，影响国防安全和国际地位，在外交中呈现军事软弱形象。

(三) 民族心理的创伤

岁币输出被视为北宋示弱，给北宋民族心理带来巨大创伤。古代中原王朝以天朝上国自居，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多称臣纳贡。澶渊之盟后北宋向辽输岁币且未收复失地，百姓和士大夫阶层难以接受，认为是耻辱，损害北宋国威。这种心理创伤在朝堂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朝堂上，部分官员主张“忘战去兵”，忽视军事建设，导致北宋军事力量衰落，军队战斗力下降。社会上，尚武精神衰落，百姓关注自身生活，忽视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使北宋面对外部威胁时更加软弱，后来面对金国威胁时不堪一击，与澶渊之盟后民族心理变化有关。

四、北宋之“赚”的剖析

(一) 战争成本的节省

从战争成本看，澶渊之盟使北宋避免巨额战争开支。在澶渊之盟前，北宋与辽国长期战争，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边境百姓生活受严重影响。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每年的军费开支达数千万缗，如“治平二年，内外兵九十三万一千余人，宗室一万二千余人，其禄廪赐予，一毫已上，皆有定式……天下所入财用，十中八九赡军”，还不包括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战争期间，大量征兵使大量劳

动力离开农田，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边境的商业活动也陷入停滞。澶渊之盟后，北宋每年只需输岁币，战争成本大幅降低。北宋可将原本用于军事防御的资源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领域，减少边境驻军，节省军费，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到农业、水利、商业等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二）经济发展的新契机

澶渊之盟后，宋辽在边境设榷场开展互市贸易，为北宋经济发展带来新契机。北宋手工业产品如丝绸、瓷器、茶叶在辽国颇受欢迎，通过榷场贸易大量出口，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仅雄州榷场在宋神宗熙宁年间，每年的贸易额就达到了“银绢钱物计四十五万余贯”，这极大地促进了北宋手工业的发展。北宋还可从辽国进口马匹、牛羊等牲畜及特产，马匹进口对北宋军事和交通意义重大，可改善军队装备、促进交通运输业发展。榷场贸易带动边境地区商业发展，促进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边境百姓通过贸易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一些边境城市如雄州、霸州成为重要商业中心，经济迅速发展。据记载，霸州榷场“商贩如织”，贸易十分繁荣。榷场贸易加强宋辽经济联系，使双方经济相互依存，减少战争可能性，为北宋经济发展创造稳定外部环境。

（三）长期和平的红利

澶渊之盟带来宋辽百年和平，这对北宋发展是巨大红利。和平环境下，北宋边境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北宋政府能集中精力进行国内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推行如王安石变法等政策，虽变法未成功，但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如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缓解农民资金困难，促进农业生产。文化方面，和平促进北宋文化繁荣，诗词、绘画、书法、哲学等领域成就卓越，理学兴起对后世思想文化影响深远。宋辽文化交流频繁，北宋诗词、绘画传入辽国，辽国音乐、舞蹈等文化元素也传入北宋，丰富双方文化生活，促进文化融合发展。

五、结论

澶渊之盟对北宋的影响复杂，不能简单判定北宋是亏还是赚。从短期看，岁币支出、军事战略失利和民族心理创伤对北宋不利；但从长期看，战争成本节省、经济发展契机和长期和平带来的红利，为北宋发展提供机遇。澶渊之盟是宋辽关系的转折点，对北宋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它使北宋在与辽关系中找到相对平衡，双方在和平基础上实现经济文化交流发展。这一历史事件也为后世处理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提供借鉴，当我们在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时，不能一味地诉诸武力，和平协商与合作往往是更具智慧的选择。通过平等对话、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各国可以在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同时，我们也要明白，和平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自身强大实力的基础之上。只有不断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尊重与话语权，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与和平稳定。

（作者单位：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唐宋时期澶州城的治废兴衰

杜宇航

2025年正值宋辽澶渊之盟签订1020周年。这一改写宋辽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与澶州城的命运深度交织。作为宋辽驿道上的关键枢纽，澶州城的崛起与流变，深刻映射着中国中古时期黄河流域地缘政治的演变轨迹。

一、地缘政治下军事重镇的崛起

澶州城（今属濮阳一带）的兴起始于交通区位与军事需求的双重驱动。据《元和郡县志》记载，澶州，本是汉代顿丘县辖地。唐武德四年（621年），分魏州之顿丘、观城二县，於今理置澶州，因澶水为名，又分置澶水县。然贞观元年因政区调整废澶州，以澶水县属黎州。至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安史之乱虽已平定，但河北藩镇割据格局已形成。由于澶州既是沟通河南、河北的陆上交通要道，又濒临黄河，是重要的水运通道，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出于扩张自身势力、控扼南北交通的目的，奏请复置澶州。至唐宪宗元和年间（806年—820年），澶州归河北道管，属上州，辖顿丘、临黄、观城、清丰四县，州境东西一百二十九里，南北七十里，户三千二百六十九，乡一十七^①，已成为人口较多、经济较发达的州级行政区。

五代时期，澶州的军事战略价值进一步提升。贞明五年（919年），名将符存审为控扼黄河渡口，在德胜口夹河修筑南北二城，中间

以浮桥相连，形成“南直北拱”的城池格局，因形如卧虎，俗称“卧虎城”。城墙周长24里，设4门。他以澶州为据点与后梁对峙经年，虽未大规模发展城市，但奠定其“河防要塞”的军事价值。至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幽云十六州丢失后，后晋为防御契丹南下，遂徙澶州于黄河德胜津，顿丘县也一并徙之，并升级为防御州。次年，原属濮州的濮阳县迁治南城，天福六年（941年）黄河浮桥复通，澶州成为华北平原南北交通的关键节点。此后至北宋中期，这里更是黄河下游唯一常年通桥的津渡，成为南北势力争夺的焦点。

北宋初年，澶州军事地位登峰造极。它既是连接开封与河北的交通咽喉，还是河北前线诸军的补给基地与战略后方，被视作拱卫京师的最后一道屏障，被誉为“北门锁钥”。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在澶州北城展开主力会战，双方激烈争夺澶州桥路的控制权，史称“澶州之战”。此战中，澶州的南北双城结构发挥决定性作用：北城紧临黄河，直面辽军兵锋，城墙“周十二里，高三丈五尺”，设瓮城、马面等防御工事，城外壕沟纵横，构成军事屏障；南城位于黄河南岸，依托汴河—黄河漕运成为行政与物资中心，商业繁荣，人口密集，兼具后勤补给、安置流民等功能，与北城以浮桥相连，形成“南攻北兵”的互补防御体系。而南北城的构造蕴含独特军事防御价值的同时，还因其城防体系的完整性与战略缓冲

^①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6《澶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性，为后来宋真宗亲临澶州战场提供了现实条件，成为促成澶渊之役关键战果的重要地缘因素。最终宋军挫退辽方主力攻势，成功守御澶州。经此一役，宋辽双方决定休兵，于1005年初订立澶渊之盟，开启较长一段的和平时期。这也成为澶州城市发展史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

二、宋辽驿道滋养下的繁荣

进入和平时期后，根据澶渊之盟，宋辽双方在各自的境内路途中设置了馆驿，为互遣的使者提供接待和住宿事宜，因此形成了从宋开封府至辽析津府的一条纵贯河北路东部的路段，也是众路当中最高效便捷的一条路。据考证，这条驿道走向大致为：从京都都亭驿出发，向北到陈桥门（景阳门），继续向东北行到班荆馆（陈桥驿），接着到长垣驿、韦城驿、卫南驿、澶州驿、德清军、大名府驿、永济县、临清县、恩州驿、冀州驿、深州武强驿、乐寿县、瀛洲驿，然后在瀛洲分为东北和西北向两条道路。东北走向莫州驿，西北走高阳县，在易水瓦桥会合向雄州驿进发，接着到白沟驿，向北到白沟河，遂进入辽境内。^①宋辽驿道的繁荣，使得以大名府、澶州为代表的一批地方中心城市地位不断上升，澶州从北宋与辽国军事对抗的前沿阵地逐渐转换为兼具外交、贸易、文化交流的复合通道。

宋辽驿道的开通，使澶州成为了北宋与辽朝之间贸易往来的重要中转站，为澶州带来了新的经济发展引擎。大量的商品通过驿道在澶州集散，吸引了周边地区的商人前来贸易，促进了当地商业繁荣。北宋时期，朝廷在澶州各地设置商税务14处，从《宋

会要辑稿》中可见包括澶州在内的整个河北路诸府州的商税额：熙宁十年，澶州的征缴商税额为三万七千七百七十六贯^②，在河北东路各州中排名第六，属于中等偏上水平。这一时期澶州地区社会稳定，人口激增。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户主一万九千三百一十七，客四千二百二十三”^③，总计有23540户。到了宋神宗元丰年间，“主三万六千六百三十七，客一万九千三百五十二”^④，总计有55989户，增长了42%。外部大环境的稳定、商贸流通的发展，也促进了澶州教育的兴起。晁补之的《澶州学生登科记》中记载，“真宗北巡，叛虏夺气，而澶之人始开门相往来。人人知本农桑、劝学校，以不忘其故家遗俗之盛，士亦稍能自有所问于时。”^⑤

澶州城市建设也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进展。澶州城自五代时期就夹黄河分南北两城，因此有南澶州、北澶州之称。然澶州北城“其规模固已陋矣，而河滨之土疎恶善隕，北城之隅复当三扫之敝。夏秋洪流暴溢，浸淫泛滥，大为州患。急则料民而缮治之，完而复圮者数矣”。加之北宋熙宁前，澶州治所一直在南城，因此对于北城的修筑不甚重视。直到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重修澶州北城，“引铁丘之土以易朽壤，市津门之木以增崇构”，

“为城五千七百七十步有畸，而外郭水濠之长如之”，“西距河墉别为长堤三千五百三十步，所以止横水啮城之害也”^⑥。今天濮阳县老城区可能仍然在宋澶州北城的基础上，西南城垣

②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五之九，第6302页。

③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57《河北道六》，第1175页。

④ 王存：《元丰九域志》卷2《河北路》，第64页。

⑤ 晁补之：《鸡肋集》卷30《澶州学生登科记》，台北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1986年版，第1118册，第626—627页。

⑥ (宋)苏颂：《澶州重修北城记》，《苏魏公文集》(卷64)，中华书局，1988年。

^① 柴玲玲：《北宋河北路交通与经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保存尚好，高十余米，城外尚有河堤一道。

三、地理变局带来的城市衰落

澶州的颓势始于黄河水患与政治格局的双重冲击。澶州作为“两河之要道”在享受优越交通优势的同时，也因濒临黄河饱受水患灾害。宋史记载中频繁出现“河决澶州”“澶州河涨”“漂溺居民”等描述，澶州所辖各县皆是受河患逼迫而迁城。澶州清丰县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因受黄河河道冲击，徙清丰县于东南十八里处，“治德清军，即县置军使”^①。澶州观城县，庆历八年（1048年）“六月乙亥，河决澶州商胡埽”^②，观城县为决河所毁，因废观城县入顿丘县，至皇祐四年（1052年），才恢复观城县建置。至十一世纪下半叶，黄河下游决溃改道更加严重，对河间以南至濮阳段的宋辽驿道影响甚大。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八月，黄河大决逼城，得益于之前的修缮，澶州北城抵御住了洪水的侵袭，而作为州治的澶州南城却为河水所冲毁，自此澶州州治迁于黄河以北，“惟以濮阳县为治”。而澶州河段决口形成的三次北流，将宋辽驿道斩作数段，大河横流，阻绝辽使，进退不能。宋廷因此决定驿道不再走澶州，改由滑州白马县北侧系桥越河，西趋黎阳。重要交通线的改道严重制约了澶州发展，之前城市建设一直受交通线所吸引，附近城镇也有明显具有向道路集中的趋势，自此之后，澶州逐渐走向衰落。

北宋末年，外患压力使得澶州再次发挥其重要北部边防城市的军事作用，政治地位甚至有所提升。“崇宁四年，建为北辅。五年，升为府。宣和二年，罢辅郡，仍隶河北东

路。”大观元年（1107年），升为开德府，府治濮阳。但长期的对外战争使得澶州内耗严重，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停滞，甚至衰退。徽宗崇宁年间“户三万一千八百七十八，口八万二千八百二十六”^③，人口仅为元丰年间的六成左右。如今濮阳县老城内的建筑只占据东南半城之地，城内西区为一大片空阔的水沼地。想当年筑城垣时，大抵不会放半城之地不利用，也是从侧面证明了澶州城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逐渐衰落，市井萧条，居民减少。

宋钦宗继位之时，北宋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金兵屡屡挥军南下，河北路成为了宋金交战的主战场，澶州扼守黄河，是守卫京师的北大门，自然也成为金兵的重点攻击目标之一。因此靖康、建炎年间，宋金双方针对澶州地区的归属权，展开了多次争夺，澶州知州王棣在此危难之际，率领澶州军民同仇敌忾，配合宗泽统领的军队，多次打退金兵的进攻。但是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加之南宋政府退保江淮的战略，建炎二年（1128年），金兵破城，知州王棣战死，澶州成为金朝的属州，并改澶州为开州，澶州作为宋朝一级州府的历史也就此终结。

从唐五代到北宋一朝，澶州的兴衰分合不仅是行政建置的调整，更是中古时期政治角力、军事需求与经济地理交互作用的缩影。站在澶渊之盟1020周年的节点回望，澶州城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凝固的历史，更是一把解读古代城市治废兴衰的钥匙，指引我们探寻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作者单位：中共濮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① （元）脱脱等：《宋史·地理二》（卷86），中华书局，2001年，第2122页。

^② （元）脱脱等：《宋史·五行一上》（卷61），中华书局，2001年，第1326页。

^③ （元）脱脱等：《宋史·地理二》（卷86），中华书局，2001年，第2122页。

2025年4~6月中共濮阳市历史大事记

《濮阳大事月报》编辑部

4月

4月2日，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领导朱良才、孙起鹏、张连才等出席会议。

4月2日，市政府与河南投资集团举行工作会谈，市长朱良才与河南投资集团总经理朱红兵就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进行沟通交流、达成多项共识。副市长聂长明，河南投资集团副总经理尚谨参加。

4月3日，全市社会工作部长会议召开，部署2025年全市社会工作。市委书记万正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孙起鹏主持会议，市领导张相坤、周浩然、邵希斌出席会议。

4月8日，市长朱良才主持召开市政府第38次常务会议。市领导周东柯、周浩然、张宏等参加。

4月9日，全市春修水利工作推进会暨医保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讲话，副市长张宏、宋成玲出席。

4月11日，全市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万正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主持，市领导周东柯、周浩然、张宏等参加。

4月15日，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领导朱良才、孙起鹏、张连才等出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邵景良、市政协主席徐慧前列席。

4月15日，市长朱良才主持召开市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东柯，副市长周浩然、张宏、聂长明等参加。

4月17日，全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万正峰出席并讲话。市领导朱良才、孙起鹏、邵景良、徐

慧前等参加。

4月18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守刚来市信访局开展接访工作，并前往范县调研产业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

4月19日，全市小麦抗旱及病虫害防治工作安排部署会议召开。市委书记万正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作具体工作部署。市领导聂长明、周东柯、张宏出席会议。

4月21日，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全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推进会。市领导孙起鹏、聂长明参加会议。

4月22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5年第4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孙起鹏、邵景良、徐慧前、张连才、周东柯等市级领导参加。

4月23日，市政府与河南投资集团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就推进濮阳综合能源项目建设等进行深入交流。河南投资集团总经理朱红兵，市长朱良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东柯参加。

4月25日，市长朱良才主持召开市政府第40次常务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东柯，副市长周浩然、张宏、蔡洪峰、宋成玲参加。

4月25日，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朱良才出席并讲话，党组成员周东柯，党组成员周浩然、蔡洪峰、宋成玲、马世

国出席，副市长张宏列席。

4月25日，市政府与省水利厅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谈，就推进金堤河综合治理工程规划进行深入交流。省水利厅厅长申季维，市长朱良才参加会谈。省水利厅副局长李建顺，总工程师韦彦学，副市长张宏，濮阳黄河河务局局长方祖辉，相关水利专家和市水利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谈。

4月27日，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河南省委会主委张震宇率调研组来濮阳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入融合对策研究”开展年度重点考察调研。民进河南省委会副主委、一级巡视员朱彤晖，副市长、民进濮阳市委会主委张宏，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邵希斌参加调研。

4月29日，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孙起鹏，市委常委聂长明、周东柯、罗有军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邵景良、市政协主席徐慧前列席会议。

4月30日，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座谈会，与濮阳市受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座谈交流。市长朱良才，市领导孙起鹏、聂长明、张相坤参加座谈。

5月

5月6日，全市奋战二季度确保“双过

半”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万正峰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主持会议。孙起鹏、张连才、唐利娟等市领导以及中原油田领导王德宇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东柯部署二季度重点经济工作。

5月7日，全市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现场会召开，总结交流经验，部署下步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东柯，副市长张宏出席。会议还对分布式光伏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5月8日，八届市委书记专题会召开，对濮阳市巡察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市领导孙起鹏、唐利娟出席会议。

5月9日，全市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警示教育会召开。市委书记万正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孙起鹏、邵景良、徐慧前等市级领导参加会议。

5月12日，市长朱良才主持召开市政府第41次常务会议。周东柯、周浩然、张宏等参加。

5月15日，市政府与中石油天然气销售河南分公司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就强化天然气供应保障等进行深入交流。市长朱良才，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东柯；中石油天然气销售河南分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罗志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永会参加。

5月19日，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领导朱良才、孙起鹏、张连才等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邵景良、市政协主席徐慧前列席会议。

5月19日，市政府与工行河南省分行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就深化政银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市长朱良才，工行河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黄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东柯，工行河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夏宗福参加会谈。

5月21日，全市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暨违规吃喝专项整治动员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万正峰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主持。孙起鹏、邵景良、徐慧前等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孙起鹏传达省委有关规定，安排全市贯彻落实具体措施。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唐利娟传达中央有关通报和全省违规吃喝专项整治动员部署会精神，通报全市违规吃喝有关问题情况，安排全市贯彻落实具体措施。

5月22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5年第5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孙起鹏、邵景良、徐慧前等市级领导参加学习。

5月2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朱良才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市领导周东柯、周浩然、蔡洪峰等出席。

5月22日，市长朱良才主持召开市政

府第 42 次常务会议。周东柯、周浩然、张宏等参加。

5月23日，在收听收看省安委会扩大会议后，市长朱良才随即研究部署濮阳市安全生产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东柯，副市长蔡洪峰参加会议。

5月25日，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全市“三夏”工作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安排部署有关工作。市领导孙起鹏、聂长明、张宏出席会议。省“三夏”工作第八指导组组长、省供销社监事会副主任李新玉及成员韩军化、刘戈到会指导。

5月27日，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召开。市委书记万正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主持。孙起鹏、徐慧前、张连才、唐利娟、聂长明等市级领导，以及中原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中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负责人参加会议。

5月27日，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领导朱良才、孙起鹏、张连才等出席会议。市政协主席徐慧前列席会议。

5月27日，市安防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并讲话，市长朱良才作工作部署，副市长周浩然、蔡洪峰、宋成玲参加。

5月2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5年第6次集体学习。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

孙起鹏、张连才、聂长明等市级领导参加学习，邀请“两代表一委员”参学共学。

5月30日，濮阳市“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万正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朱良才主持会议。市领导聂长明、周东柯、蔡洪峰、宋成玲参加会议。

6月

6月5日，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领导朱良才、孙起鹏、张连才等出席会议。

6月6日，市长朱良才主持召开市政府第43次常务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东柯，副市长周浩然、蔡洪峰、宋成玲参加。

6月6日，市政府党组开展集体学习研讨。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朱良才讲话，党组副书记周东柯，党组成员周浩然、蔡洪峰、宋成玲、马世国出席。周浩然、宋成玲作交流发言。

6月8日至9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到濮阳市开展老年助餐服务工作三级联动专题调研。李亚先后深入濮阳县朝阳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濮阳市华龙区站前社区老年餐桌、南乐县谷金楼镇后岳连村长者食堂等地调研。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濮阳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志，省、市人大代表的情况汇报及意见建议。

6月9日，全市总河长会议暨防汛备汛调度会召开，贯彻落实全省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市工作。市委书记万正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朱良才主持会议。聂长明、周东柯、张宏、牛全瑞、方祖辉等市级领导出席。

6月12日，省委副书记张巍到濮阳市濮阳县调研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在食品加工企业展区和生产车间，张巍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联农带农和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在濮阳县清河头乡鲁五星村，张巍调研乡村振兴、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

6月13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市委书记万正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朱良才主持。唐利娟传达中央、省有关会议和通知精神。市领导孙起鹏、邵景良、徐慧前、张连才、聂长明、周东柯出席。

6月1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朱良才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对政府系统集中整治违规吃喝突出问题再敲警钟、再严禁令，确保政府系统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取得实效。

6月17日，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领导朱良才、孙起鹏、张连才等出席会议。

6月18日，市长朱良才主持召开市政府第44次常务会议。副市长周浩然、张宏、

蔡洪峰、宋成玲参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丽玲、市政协副主席张雷列席有关议题。

6月2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市长朱良才，市领导孙起鹏、邵景良、徐慧前、张连才、唐利娟、聂长明、周东柯等出席。

6月24日，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暨“书记·代表公民面对面”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万正峰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邵景良主持。市领导聂长明、周东柯、张相坤、李莉荣、林宪革、刘翠、赵丽玲，以及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剑飞参加。

6月27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5年第7次集体学习（扩大）报告会。市委书记万正峰、市长朱良才，以及邵景良、徐慧前、张连才、聂长明等市级领导出席报告会。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唐利娟主持。会上，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康青选作辅导报告。聂长明、赵丽玲、曹拥军、谢传芳等作书面交流。

6月30日，市委书记万正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领导朱良才、孙起鹏、唐利娟等出席会议。



4月1日，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开展“追思革命先烈 延续红色血脉”主题党日活动。



4月9日，全市党史方志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召开。



4月25日，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召开年轻干部谈心谈话会。



5月15日，《濮城镇志》首发式暨全市乡镇志工作推进会在范县濮城镇召开。



6月6日，纪念邓小平清丰“六六讲话”发表80周年交流座谈会在濮阳市清丰县单拐村召开。



6月27日，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召开党史文献片《抗日战争中的段君毅》脚本征求意见会。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

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

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

